

多元互動：四川古蜀文化和珠江三角洲古越文化融入中華文化的過程

鄒興華 香港文化博物館館長（非物質文化）

一、前言

本文主要根據成都平原和珠江三角洲平原出土的先秦考古資料，對兩地的古代歷史進程試作勾勒，從兩地區的差異，去探討古蜀和古越兩支古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性。位處中國南方的古越和西南方的古蜀，與中華文明核心的中原地區相隔數千里，中間有崇山峻嶺阻隔，屬中華文化的邊沿地區，古籍對兩族的記載極為有限，古越和古蜀亦沒有自己的文字去記載自己的歷史，及至戰國末和秦代，古蜀和古越先後被秦軍所滅，族人星散，兩族歷史從此湮沒。到二十世紀下半葉，經考古學者在成都平原和珠江三角洲不斷的發掘和研究，古蜀和古越文化才逐漸重現於世，尤其近年三星堆遺址兩個器物坑和金沙遺址的重大考古發現，在學術界引起極大震撼，探索古蜀文化已成為學術界的一個熱點。近年珠江三角洲地區的考古工作亦有所突破，深圳咸頭嶺遺址的發掘，把本區的史前史推至約 7,000 年前；1997 年香港馬灣東灣仔遺址、2000 年博羅橫嶺山遺址的發掘，更先後被評選為當年度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這些重要的發現，對研究古蜀和古越文化的流變，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二、年代框架

1993 年，筆者嘗試從較宏觀的角度，對珠江三角洲地區史前文化進行研究和分期，把本區史前文化分為五期，並稱之為珠江三角洲一至五期文化¹。這五期文化，從約 6,500 年前開始，至 2,500 年前結束，涵蓋本地區的新石器時代中晚期至青銅時期。雖然過去十多年來，珠江三角洲地區的考古工作發展迅速，新的資料不斷湧現，尤其 2005 年深圳咸頭嶺遺址的發現，可把珠江三角洲一期文化的上限提早約 500 年至距今 7,000 年前，但五期文化的基本結構仍然適用，更由於新資料的出現，各期文化的研究可更加深入，文化面貌更加清晰。

成都平原的考古學文化框架，情況較為簡單。由於成都平原的考古工作開展較早，而且遺址發掘面積大，遺存豐富又具代表性，因此成都的考古學文化都以典型遺址命名(圖一)。據江章華和李明斌的研究²，成都平原上最早出現的，是以新津縣寶墩村遺址命名的寶墩文化，年代範圍大致距今 4,500 至 3,700 年之間；接著出現的是以廣漢三星堆遺址命名的三星堆文化，年代介乎距今 3,700 至 3,200 年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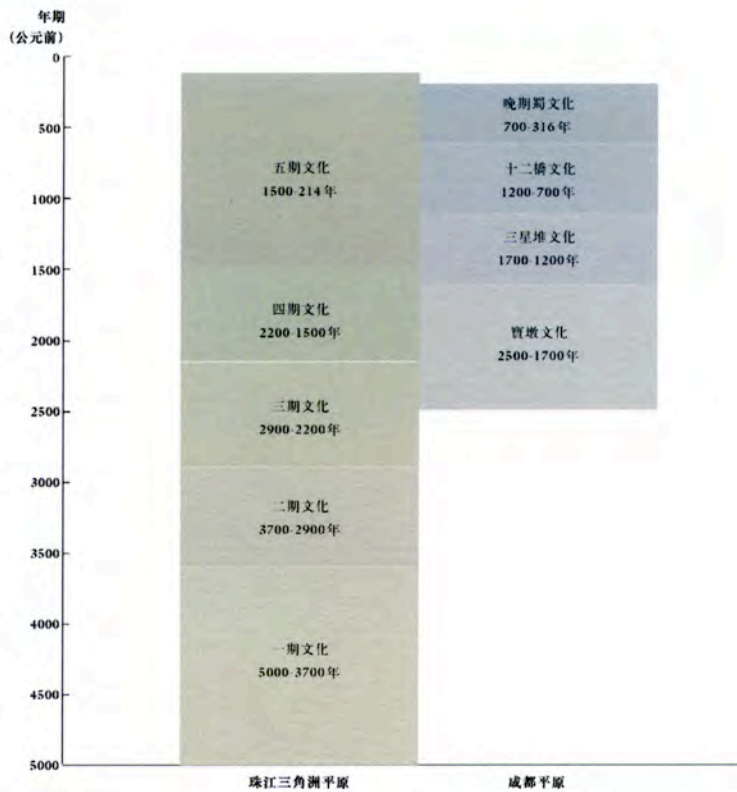


(圖一) 成都平原主要考古遺址分布圖

緊接其後的是以成都市十二橋遺址命名的十二橋文化，年代範圍在距今 3,200 至 2,700 年之間。前面三個時期的考古學文化，統稱為早期蜀文化，到戰國時期，成都平原的青銅文化呈現一派新景象，被稱為晚期蜀文化，直至公元前 316 年秦滅蜀而止。從珠江三角洲和成都平原的考古學編年(表一)，可見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歷史，比成都平原的要早約 2,500 年，但從兩地考古遺存所反映的社會文化進程比較，古蜀文化卻遠勝古越文化。

三、古越文化的流變

珠江三角洲一期文化，以彩繪泥質圈足陶器、壓印紋白陶器、細繩紋夾砂圓底陶器、小型磨光石器、條紋石拍等遺存為主要的文化特徵。在環珠江口地區，至今已發現 20 多處屬這時期的遺址，包括香港春坎灣、大灣、湧浪，深圳咸頭嶺、大梅沙，增城金蘭寺，高要蜆殼洲，中山龍穴，珠海後沙灣，澳門黑沙等，並有「咸頭嶺文化」³和「大灣文化」⁴等不同的稱謂。這期文化原來的年代範圍在距今 6,500 至 5,700 年之間，由於最近深圳咸頭嶺遺址的發現，年代可前推約 500 年。而這期文化中最具特色兩種器物：赭紅彩鏤孔圈足泥質陶盤、壓印紋白陶器，製作精美，與嶺南地區以繩紋圓底夾砂粗陶器為傳統的新石器文化顯然不同。不少學者都認為，這些白陶和彩陶，應源自長江中游地區的湯家崗文化和大溪文化。



(表一) 珠江三角洲平原、成都平原考古文化編年

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何介鈞已提出大溪文化主要通過沅水南傳珠江三角洲的說法，他指出由沅水到西江有兩條途徑，一是由沅水支流渠水陸行數里入西江上源之一的潯江，至柳州入西江；一是溯沅水主源清水江，過貴州雲霧山，入古代牂柯江的支流之一曹渡河，沿牂柯江直達珠江三角洲⁵。位於湖南西南部洪江市的高廟遺址，屬於沅水上游一處河旁貝丘新石器時代遺址。遺存下層為高廟文化(距今約 7,800 至 6,800 年間)，發現一定數量的白陶器，器身有雙線或單線刻劃紋和篋印紋和戳印紋結合的圖案，其中鳥頭、羽翅、獸面和八角星圖案尤為特色；上層屬高廟上層文化(距今 6,300 至 5,300 年間)，出土較多彩陶，亦有少量白陶⁶。可見，高廟遺址很可能是長江中游原始文化南傳的其中一站。不過，近年廣西曉錦遺址的新發現，顯示資水亦可能是文化南傳的通道之一。區家發根據粵北曲江石峽遺址下層出土的戳印紋和鏤孔白陶圈足盤、細繩紋圓底釜等器物推斷，湯家崗文化南傳至南海之濱，可能另有一條路線，即溯湘江而上再沿漓江而下，進入西江而至珠江三角洲；又或轉瀟水上溯再沿賀江而下進入西江⁷。上述關於高廟遺址、曉錦遺址和石峽遺址的發現，僅是文化傳播路線上的其中三點，隨著湘、桂、粵三方的考古學者的不斷努力，應很快從點串連成線，釐清這條古代文化傳播路線的面貌。

珠江三角洲二期文化，年代範圍在距今 5,700 至 4,900 年間。由於遺址少，文化遺存單薄，二期文化的面貌至今仍然模糊。到珠江三角洲三期文化時，本區轉而受到長江下游較先進的原始文化的影響，文化面貌出現很大的變化，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階段。三期文化的年代範圍在距今 4,900 至 4,200 年間，發現這期文化遺存的遺址不多，約十處左右，但與前兩期比較，遺址面積顯著增大、文化層較厚，出土的遺存十分豐富，較著名的遺址有香港的湧浪和沙螺灣岬角、珠海寶鏡灣、三水銀洲等。

石峽文化的年代範圍約在距今 4,700 至 4,200 年之間，與珠江三角洲三期文化大約同時。石峽文化遺址目前已發現了幾十處，主要分佈在廣東北部，以韶關市轄下的曲江、始興、翁源、仁化、英德、南雄六縣為中心，東達惠陽的連平和汕頭的揭陽縣，西達肇慶的封開縣⁸。珠江三角洲地區，雖然不屬石峽文化的範圍，但仍可看見珠江三角洲三期文化和石峽文化之間的互動，例如三水銀洲遺址墓葬 M30 出土的一件釜形鼎⁹，是環珠江口史前文化中年代最早的一件三足器，器足瓦狀，多見於石峽文化的三足器中，顯然受石峽文化所影響；同時，石峽墓葬中亦出土了多件幾何印紋和附加堆紋矮圈足罐，如墓葬 M45 的曲折紋矮圈足罐，乃珠江三角洲三期文化的典型陶器，可見二者之間的交流。

年代範圍在距今 4,200 至 3,500 年間的珠江三角洲四期文化，是史前三角洲地區的一段繁榮發展期，遺址的面積亦較前擴大，超過一萬平方米的遺址十分普遍，說明先民的活動頻繁。著名的遺址有香港龍鼓灘、東灣仔、下白泥、陳家園、蠔涌、沙下(圖二)、東莞村頭，南海灶崗、魷魚崗，三水銀洲，佛山河宕，珠海東澳灣等。



(圖二) 西貢沙下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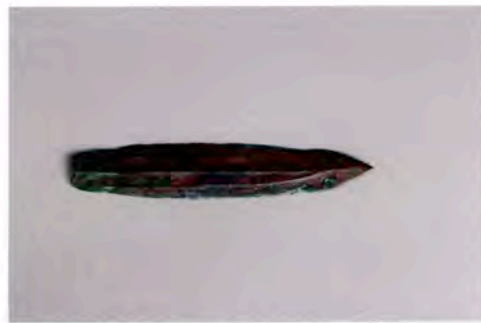
(鳴謝古物古蹟辦事處提供照片)

當珠江三角洲一期文化時，先進的長江中游原始文化曾透過沅水南傳；但到了三角洲四期文化時，形勢卻逆轉，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四期文化，曾沿西江水系上溯，翻越南嶺，到達沅水上游一帶，考古證據可在湖南靖縣筲篷坡遺址找到。據主持發掘的賀剛介紹，1988 至 1990 年間曾三次發掘筲篷坡，共揭露面積近 3,500 平方米。遺存極豐富，可分為早、中、晚緊密銜接的三個時期，從陶器分析，中、晚期陶器與珠江三角洲四期陶器遺存有很多共性：均以夾砂陶佔絕對多數；二者陶器造型相同，流行圓底器、圈足器，不見三足器；二者器形相近，均以釜、罐、鉢、盆、盤、碗、杯等作為主要器類；皆以交錯繩紋和條紋為主流，並見曲折紋、葉脈紋和雲雷紋，幾何印紋的拍印方法和部份器口沿面與頸部的旋稜風格如出一轍，因此賀剛推斷它們應屬於同一個考古學文化¹⁰。與筲篷坡遺址內涵一致的遺存，還見於沅水上游的靖縣城關、太陽坪、通道縣大荒，以及資水上游的城步縣西岩等遺址，珠江三角洲四期文化向北傳播到湘南地區的歷史脈絡已十分清楚。

珠江三角洲五期文化，年代範圍原定在距今約 3,500 至 2,500 年間，但從歷史的發展脈絡看，其下限可延申至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統一嶺南之時。繼承前期文化的發展勢頭，此時的珠江三角洲發展更為興盛，在三角洲平原及沿海島嶼，皆可發現先民的足跡，已發現的遺址超過五百處。此時嶺南地區普遍出現青銅器，說明已進入了青銅時代，但在環珠江口地區出土的青銅器，以實用的工具和武器為主，包括斧(圖三)、鉞、戈、矛、劍、鏃、篋刀(圖四)、魚鉤等，絕少發現青銅容器，與中原以青銅禮樂器為主的青銅文化顯然不同。由於鑄銅技術較原始，嶺南青銅器一直不甚發達。



(圖三) 南丫島榕樹灣出土銅斧



(圖四) 大嶼山蟹地灣出土銅篋刀

相反，當時珠江三角洲的製陶工藝卻十分發達，燒窯技術比前階段更有所提高，陶窯火候達到攝氏 1,200 度左右，能燒製成硬如石塊般的硬陶器，及掛上青釉的原始瓷器，更出現大型的窯場，如博羅的銀崗(圖五)和梅花墩遺址。兩窯場主要生產拍印幾何紋的硬陶器和青釉原始瓷器，雖然器物種類繁多，但規格整齊劃一，幾何紋圖案極之豐富，拍印工整，肯定是出自專業陶工之手。在窯場以東約 30 公里的橫嶺山，也發現了一處大型的青銅時代墓地¹¹。在博羅發現如此大



(圖五) 博羅銀崗龍窯遺址

片的公共墓地，結合兩處大型的、專門生產幾何印紋硬陶器的窯場，可推斷古代的博羅人口較為集中，社會結構較複雜，已出現專業的陶工，促進印紋硬陶器的生產；商業較發達，其生產的幾何印紋硬陶器，遠銷珠江三角洲區內各地。很多學者認為，廣東先秦時期曾經歷過古國階段，徐恒彬更指出，夔紋陶文化區應屬於南越文化區域(圖六)，區內有蒼梧、縛婁、陽禺、驩兜等國¹²，今天的博羅，可能與古代縛婁國有關。



(圖六) 西貢沙下出土的夔紋陶罐
(鳴謝古物古蹟辦事處提供照片)

當嶺南地區以夔紋陶為代表的原始文化蓬勃發展之時，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早已跨過文明的門檻，並經歷了夏、商、周三代王朝的更替。由於嶺南原始文化強盛，中原商周文化的影響就較弱，直至秦始皇以強大的軍事力量征服嶺南後，當地的社會和文化，才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

四、神祕的古蜀文明

蜀文化的高度，與三代文明並駕齊驅，令人驚訝；但蜀文化未發明文字記載自己的歷史，當古蜀國被秦國滅後，蜀文化亦隨風消逝，早已為世人淡忘。本來來無踪、去無迹的古蜀文明，卻因為 1986 年三星堆兩個埋藏坑的發現而重現人間，那些造型詭異的青銅面具、神樹，鑄工精細的青銅羣像，精美的金器和玉石器等，在三星堆突然出現，彷彿從天而降；其後成都平原一系列史前城址的發現、成都十二橋和金沙遺址的發掘，更為重現於世的古蜀文明添上姿彩。



(圖七) 成都平原六城遺址分布圖

目前在成都平原發現年代最早的考古學文化是寶墩文化，年代範圍在距今 4,500 至 3,700 年間，因新津寶墩遺址出土豐富的文化遺存而得名。之後，考古學者在成都平原相繼發現多座年代相當的史前城址，即：都江堰芒城村、郫縣古城村、溫江魚鳧村、崇州雙河村和紫竹村(圖七)。這六座城址，主要呈長方形，其中除寶墩面積較大之外，其餘五座面積介乎 100,000 至 300,000 平方米。從聚落考古角度研究，很多學者都認為城址是一種超大型聚落，是周圍地域各種活動的中心，城內主要集聚非農業人口，並控制着周鄰的小型聚落，因此，城址的出現，是所有文明的共同特徵，亦是文明時代的最集中概括¹³。

如果把古城址的考察範圍擴大，可看到全國已發現超過一百座史前城址，主要分佈在四大區域：黃河中下游平原地區、長江中游兩湖平原地區、長江上游四川盆地、蒙古高原河套地區。在四大區域中，以長江中游兩湖平原史前遺址年代最早，而且數量亦多，目前已發現了九座城址，即城頭山古城、陰湘城、走馬嶺古城、鷄叫城、門板灣古城、鷄鳴城、馬家院古城、陶家湖古城、石家河古城。正當石家河古城以王者之勢，統轄著長江中游地區之時，長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才相繼出現寶墩、魚鳧村、郫縣古城、芒城、雙河、紫竹等六座城址，除寶墩面積較大之外，其餘的規模，與長江中游屈家嶺文化時期的六座城址相當。有學者曾把寶墩文化和周鄰文化和遺址進行比較，發現寶墩文化與四川東部長江沿岸發現的哨棚嘴文化有較多的聯繫和相似之處，應屬一個大文化區系中的兩個小的區域文化¹⁴，而哨棚嘴文化的年代範圍在距今 5,000 至 4,000 年間，出現的時間比寶墩文化早，因此，寶墩文化很可能源自川東的哨棚嘴文化；而城址的建設，亦可能受更東面的長江中游古城所影響。

三星堆文化是從寶墩文化發展起來的一支青銅文化，年代範圍在距今 3,700 至 3,200 年間。三星堆文化以極為發達的青銅冶鑄業和玉石工業聞名於世，出土青銅容器有尊、壘、甗、盤等種類，另有極富本土特徵的青銅神像、面具、人像、動物像、神樹、牌飾等；玉石器有圭、璋、鉞、琮、璧等禮器，斧、鑿、斤、刀、錐、矛等工具，以及珠、環等飾件；陶器則以袋足封口盃、袋足鬲形器、高柄豆和豆形器、聳肩小平底盆、大圈足盤、圈頂器蓋、鳥頭柄勺等最富特色。三星堆文化可分為前後兩期，中間以公元前 1450 年為界¹⁵，前期玉石器工業已相當發達，青銅器卻十分罕見，只有三星堆遺址及其附近出土的幾件鑲嵌綠松石牌飾，由於與中原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鑲嵌綠松石青銅牌飾的風格十分相似，應是中原青銅冶鑄技術輸入成都平原的證據¹⁶。三星堆文化後期玉石器工藝更加發達，青銅冶鑄工業亦有重大發展，尤其在 1986 年三星堆遺址發現的兩個埋藏坑¹⁷，出土了大量造型奇特而又碩大的青銅神像、神樹、面具祭器，可媲美中原商王朝的青銅重器，其文化程度之高，超乎世人的想像，在學術界引起極大震撼。據研究，兩個埋藏坑出土青銅器共 913 件，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具有中原商代風格的青銅容器，主要為尊和壘，僅佔所出銅器的 2.5%；另一類銅器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如銅立人、人頭像、人或獸面具、神殿、神壇、神樹等，佔出土銅器的 97.5%，反映了當地社會的祭祀禮儀¹⁸。兩類銅器所佔比例的巨大反差，說明三星堆文化的青銅風格自成體系，商文化對它的影響頗微弱，在眾多的商代青銅容器之中，三星堆文化只選用了尊和壘，而尊、壘出土時多盛有玉石器、海貝和象牙，功能變為盛貯器，顯然和商文化中尊、壘作為盛酒和食

的禮器功能有別，這反映三星堆文化的青銅禮制與商代的青銅禮制在形神上截然不同。

三星堆文化遺址分佈很廣，幾乎遍及整個四川盆地，但它的中心遺址是廣漢市三星堆遺址。這遺址其實是一座宏大的古城址，面積達 2,600,000 平方米，比石家河城址大兩倍多，與鄭州商城相當。城內文化遺存極豐厚，底層屬寶墩文化堆積，推測寶墩文化時期，三星堆已是一座古城，和其他幾座古城同時聳立在成都平原之上。進入三星堆文化早期，其他幾座古城同時消失，獨剩下宏偉的三星堆古城，顯示三星堆成爲成都平原上唯我獨尊的權力中心，它的規模，堪與同時期的商王朝中心鄭州商城匹敵，有學者認爲當時成都平原已形成蜀國，三星堆古城就是古蜀國的都城¹⁹，因爲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已提到「蜀」方國，而周原卜辭中也出現了「蜀」，《尚書·牧誓》記載參加周武王討伐商紂的八國中也有「蜀」，顯然三星堆文化與商文化很早便有接觸，以致三星堆遺址出土了一定數量帶商風格的青銅器和玉石禮器。

廣漢三星堆古城的廢棄，以至成都金沙遺址的興起，可能代表著古蜀國內一次王朝的更替。金沙遺址位於成都市區西部，分佈面積超過五平方公里，自 1995 年以來，曾對遺址內的三和花園、蘭苑、金沙園、燕莎庭院、將王府邸、芙蓉苑、博雅庭韻、春雨花間等二十多個地點進行調查和發掘，面積超過 100,000 平方米，發現遺址布局嚴緊，可分爲大型建築基址區、一般居住區、墓地、祭祀區等，在大型建築基址區內，發現了由五座房址組成的大型建築基址，總面積在 2,000 平方米以上，推測可能是宮殿建築。遺址出土金器、銅器、玉器、石器、象牙、骨器、漆木器等 5,000 多件，其中銅器約 1,500 件，有立人像、立鳥、牛首、虎、戈、璧形器、方孔形器、眼形器、鈴、貝飾等，其中不少器物的造型，與三星堆埋藏坑出土的器物十分相似，但器型較細小；而金器、玉石器、象牙、骨器等造型亦與三星堆的非常接近，說明兩個遺址之間有極密切的關係。

金沙遺址的年代，實與十二橋文化的年代相當。十二橋遺址位於成都市十二橋，1985-1987 年兩次發掘，揭露面積 1,800 平方米，地層堆積可劃分爲 13 層，其中 10 至 13 層爲十二橋文化遺存，以尖底杯、尖底盞、尖底罐、喇叭口罐、斂口罐和各式圈足陶器爲主要文化特徵²⁰。自十二橋文化確認以來，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市南部古郫江兩岸發現和發掘了十多處十二橋文化遺址，包括：撫琴小區、方池街、君平街、指揮街、鹽道街、岷山飯店、岷江小區等，綿延十餘公里，被稱爲十二橋遺址群。從地理分佈看，十二橋遺址群處於金沙遺址的

東南外圍，如果金沙遺址可確認為古蜀國的第二個都城，那麼，十二橋遺址群就是王城外圍百姓的聚居地了。從現有的考古資料看，十二橋文化的分佈和影響範圍比三星堆文化廣，東達鄂西，與中原的商文化和長江中游文化有密切的聯繫；北至陝南，與陝西地區的周文化和獼猴文化也有緊密聯繫。

緊接十二橋文化後的東周時期，四川成都平原的青銅文化呈現出新一輪興盛景象，這時期應當是文獻記載的開明氏古蜀國時期。當時蜀國青銅器冶鑄工藝得到極大發展和普及，成都平原出土了大量工藝精湛的青銅器，包括釜、釜、甗等炊器，柳葉形劍、雙弓形耳矛、烟荷包形鉞、三角援無胡戈、中援中胡戈等兵器，曲頭斤、長身闊刀斧、翹首刀等工具，其中不少是仿效楚系銅器，說明蜀國與長江中游的楚文化有很密切的關係。此外，先前不見的船棺和獨木棺的墓葬，也開始在成都平原大量出現。2000年在成都市商業街發掘的一座戰國早期的大型船棺、獨木棺墓葬，規模相當驚人，共發現船棺、獨木棺17具，其中最大的一具長18.8、寬1.5、高1.12米，體量之大，堪稱全國之最，推測是開明王朝王族甚或蜀王本人的墓地²¹。這種突然出現的墓葬習俗，反映統治階層的構成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開明氏蜀王朝經歷幾百年發展，最終於公元前316年，為秦惠文王派遣的大軍所滅，蜀文化亦漸融入中原文化之中。

五、結語

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古越文化和四川成都平原的古蜀文化，雖然同處於中華文化的邊遠地區，能夠相對獨立地發展，但他們所走過的道路不盡相同，所展現出來的文化高度亦有很大的差別。引致差別的主要原因，可能與古越和古蜀先民接受周鄰較先進文化的程度有關，從前面勾勒的情況可知，珠江三角洲古越先民約於7,000年前已開始在區內活動，並受長江中游先進的湯家崗文化所影響，但早期的2,000多年裏，發展十分緩慢，遺址面積細、數量少，文化遺存薄弱，文化面貌原始，說明先進的長江中游原始文化未能帶動珠江三角洲先民的發展；及至距今4,000年前左右，以幾何印紋陶器為特徵的珠江三角洲文化，突然進入一個大發展期，人口驟增，遺址範圍擴大，社會組織較前複雜，恰巧當時長江中下游諸原始文化衰落，嶺南的越文化反而跨過南嶺，向嶺北地區挺進；但當先進的商文化跨越長江，在鄱陽湖西岸一帶形成吳城文化之時，嶺南越族對商文化和吳城文化的接受仍十分有限，以致仍然停留在漁獵採集的原始生計模式中，未能因農耕技術的帶動而跨進文明的大門。

相反，成都平原的古蜀先民雖然出現較晚，但他們從開始所展現的文明程度之高，實在令人咋舌。寶墩文化時期的一系列古城址，三星堆文化燦爛的青銅文化和巨大的都城，均說明古蜀先民曾吸收長江中游先進的屈家嶺和石家河文化，以及中原的夏商文化，從而建立一個媲美商王朝的古蜀國。可見，在古越和古蜀文化的發展過程中，長江中下游諸原始文化曾起著關鍵的作用，正如嚴文明教授指出，中華民族的古老文明，其實是由以粟作農業為基礎的黃河流域文明，和以稻作農業為基礎的長江流域文明所構成，是一個大兩河流域文明，這裏的史前文化很早便形成了多元一體的格局，把文化的多樣性和統一性辯証地結合，最後形成以中原為核心的多元一體，再發展到多元一統²²。古越文化、古蜀文化與長江中下游原始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正好印證嚴文明教授多元互動之說。雖然古越和古蜀先民對來自長江甚或黃河流域的先進文化有不同程度的接受，並走過不同的發展道路，最終卻殊途同歸，皆為秦國軍隊所消滅，古越文化和古蜀文化亦消融在華夏文化之中。

註釋：

- ¹ 鄒興華：〈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分期〉，載於鄒興華編：《嶺南古越族文化論文集》，香港：香港市政局，1993年，頁40-55。
- ² 江章華、李明斌：《古國尋踪—三星堆文化的興起及其影響》，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187-191。
- ³ 李松生：〈試論咸頭嶺文化〉，載於深圳博物館編：《深圳考古發現與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
- ⁴ 鄧聰、黃韻璋：〈大灣文化試論〉，載於鄧聰編：《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395-450。
- ⁵ 何介鈞：〈環珠江口的史前彩陶與大溪文化〉，載鄧聰編：《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321-330。
- ⁶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洪江市高廟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2006年第7期，頁9-15。
- ⁷ 區家發：〈淺談長江中下游諸原始文化向廣東地區的傳播與消亡〉，載於鄒興華編：《嶺南古越族文化論文集》，香港：香港市政局，1993年，頁24-32。
- ⁸ 楊式挺：〈石峽文化類型遺存的內涵分佈及其與樊城堆文化的關係〉，載廣東省博物館等編：《紀念馬壩人化石發現三十周年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頁158-168。
- ⁹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廣東三水市銀洲貝丘遺址發掘簡報〉，《考古》，2000年第6期，頁24-36。
- ¹⁰ 賀剛：〈南嶺南北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晚期文化的關係〉，載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會第九次年會論文集1993》，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頁175-194。
- ¹¹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羅橫嶺山—商周時期墓地2000年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年。
- ¹² 徐恒彬：〈廣東古國問題初論〉，載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華南考古1》，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頁63-68。
- ¹³ 段宏振：〈中國古代早期城市化進程與最初的文明〉，《華夏考古》，2004年第1期，頁77-89。
- ¹⁴ 江章華、王毅、張擎：〈成都平原早期城址及其考古學文化初論〉，載宿白編：《蘇秉琦與當代中國考古學》，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年，頁699-721。
- ¹⁵ 孫華、蘇榮譽：《神祕的王國》，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頁49-54。

¹⁶ 趙殿增：〈三星堆與二里頭銅牌飾研究〉，載宋鎮豪、肖先進編：《殷商文明暨紀念三星堆遺址發現七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121-128。

¹⁷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¹⁸ 孫岩、揚紅育：〈當地傳統和外來影響—從三星堆和新淦看地方青銅文化形成的不同模式〉，載許倬雲、張忠培編：《新世紀的考古學—文化、區位、生態的多元互動》，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頁497-517。

¹⁹ 江章華、李明斌：《古國尋踪—三星堆文化的興起及其影響》，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頁7。

²⁰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成都十二橋商代建築遺址第一期發掘簡報〉，《文物》，1987年第12期，頁1-23。

²¹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商業街船棺、獨木棺墓葬發掘簡報〉，《文物》，2002年第11期，頁4-30。

²² 嚴文明：〈東方文明的搖籃〉，載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文化的饋贈—漢學研究國際會議論文集·考古學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45-64。